

國人應有的新認識與新行動

鄔克定



MG
D693.09
425
2



國人應有的新認識與新行動

鄒克定

致力和運的同志，在蔣系方面看起來，便都是些賣國求榮的漢奸，（其實，蔣系過去也談和平，現在也談和平，祇因受共產黨的挾持，不得不弄出這一套一鼻孔出氣。談和平與想和平，就是漢奸或準漢奸，這是共產黨對和運同志的侮辱。）不過想借此機會，使官做得更大一點，使財發得更多一點。以這種歪曲的理論，我們不必追究。但是我們不能不促使大家注意者，就是過去的抗戰，現在和平，目的全為救國，只是採用的方式不同，抗戰而不能達到救國的目的，便應改變方式，以求救國目的的達到，在此種不得已而又迫切需要的情形下，採用和平的方式來挽救垂危的國族，果真是漢奸的行為嗎？這個應該是有識之士萬無一且不應同意的。因此，我在最近也毅然決然脫離蔣系的統治，開始和平而奮鬥，我敢說和平救國的願望一日不達到，我個人是準備犧牲一切利益，甚至生命，來向此標的邁進，這與往昔參加各種愛國救國運動不惜犧牲一切，正復相同。要是亦竟被人目為漢奸，那也只好和其他參加和運的同志一樣，姑候事實來證明，來洗刷！

自民國二十一年到最近的以前，在這一時期期中，我始終忠於國家，忠於黨與政府，為了表示我的確赤誠愛國，曾經不顧一切做了許多救國的工作。過去，我相信「抗戰必勝」相信到迷信的程度，但經過三年來事實的演變，漸漸把我這種迷信打破了，不但消極的感覺到我這種迷信完全打破了，而且積極的感覺到我應當有一個轉變，這個轉變，就是脫離抗戰，投向和平。我在抗戰三年後而仍有今日此一着，決非偶然，詳細說來，其話很長，我在此除了從大體方面列舉一些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，來證明戰未必勝和未必亡以外，對個人過去與今後，並不想多作介紹，多作辯護，既抱定犧牲決心，便只有毀譽由人，個人的榮譽得失和生死，在我心目中並不重視。過去的一切，國人如不健忘，也許還能記憶，今後的一切，國人如加注意，也許終能了解。

首先須要敘述的，還是很概括的報導，那就是在內地（戰區除外）絕少看到戰時的緊張狀態，說得嚴格些，在內地（戰區除外）根本看不到國家像是在進行着戰爭的樣子，（炮火與飢餓的襲擊，並沒有轉變官員和民衆自私自利醉生夢死的心態）除了偶然有空襲警報，纔能偶然發現一般民衆東逃西竄，驚惶憂愁的情緒，但此驚惶憂愁的情緒，隨着警報的解除，馬上又消失了。浙江如此，江西如此，湖南如此，湖北如此，我所走過的地方無不如此，我沒有走過的地方聽說也無不如此。這也許是中國人民遺傳的鎮定吧！但是我們決不能這樣想，更不能這樣

說，這正是最危險的現象；戰事是那麼激烈，政府與人民還是如此鬆懈，所謂全國動員，全面抗戰，真不知從那些地方纔能看出來。

我以為自動在內地從事流動宣傳工作，確是一樁極艱苦的事，他們在轟炸的威脅下，在風雨的襲擊中，手提着箱子，肩背着被蓋，在崎嶇的旅途上走着，任憑遭遇着多少困難，從來沒有因困難而停止前進，他們有的時候固然能夠不受飢餓的侵襲，有的時候也會要餓着肚子掙扎，他們住的是破廟，把身子睡在一堆禾草上或地板上，就這樣休息一天的疲勞，他們往往把嗓子叫啞了不能再開聲，他們往往勞動得手足麻木不能再動彈，腰酸背痛，頭昏腦悶，在他們之間更是習見的現象。為了抗戰，為了國家，他們拋棄固定的職業，離開可愛的家庭，流浪在外面，情願受苦，受難，受盡驚險，過着一向未曾過慣的艱苦生活；像這樣堅苦卓絕地為國奮鬥，姑無論直接對國家有無重大的貢獻，單憑其百折不撓犧牲奮鬥的精神，已足感動一些自私自利，醉生夢死的人們，誰能說這種工作不偉大？但是痛心之事，接踵而至，一般地方黨政機關的主持人，本身不願幹，却總是希望大家在各地所得到的不是同情和幫助，而是白眼和阻礙。這些意外的打擊，可說是每個流動宣傳工作者都親身經歷過的。都像這樣下去，難道是抗戰中的好現象嗎？

我以為政府應該很誠意接受人民合理及善意的批評與建議，纔有助於抗戰。

然而內地完全籠罩在三種黑影下，早已沒有了是非，沒有了好壞。所謂三種黑影：（一）是下情（指人民而言）不能上達，任你什麼真知卓見，完全不能引起當局的注意和尊重；（二）是中間人（指中央以下各級政府而言）為鞏固自己的地位，極盡隱惡揚善之能事，自己的罪惡既不會很坦白的承認與糾正，更不願也不容一般人來揭穿；（三）是高高在上者（指中央而言）只重視片面的書面報告，不能洞察各地實情，有的或是同一鼻孔出氣，有的或竟彼此狼狽為奸，因此，中共是糊裏糊塗，裝聾作啞，中央以下各級政府是昧着良心，自欺欺人，只有一般人民纔是真正洞達國情者，但苦於當局的昏迷，只有徒呼奈何。過去我們往來各地間，如果發覺政府有不當的措施或黑幕，我們隨時隨地用口頭或書面向政府提出意見，此種意見，在我們是不顧一切而累累提出。記得我在過去曾感到抗戰期間最嚴重的問題，並不在單單叫國人出錢出力，而是怎樣叫國人能夠有錢可出，有力可出，於是我根據這一原則，上書政府，說是「要鼓勵國人忠勇犧牲，也要設法避免其無意義的犧牲，要勸勉國人忍耐痛苦，也要設法減除其不必要的痛苦；」希望政府一方面了解人民的「真苦」，一方面開發蘊藏的「潛力」，以做到不浪費實力而能不斷增厚實力的地步；再不應放縱一般喪心病狂的貪官污吏，無端驅使人民作無意義的犧牲，並加重人民不必要的痛苦。此書在報端披露後，雖獲得輿論的同情，但政府顯然並不為然，所以一般不良現象，依然未稍改觀。又記得我過去曾感

到江西教育的有名無實，於是根據多方攷察的結果，針對其弱點，上書贛省當局（曾在江西出版）提出極詳細的意見。此書出版後，雖也被各界公認為江西教育界的暮鼓晨鐘，但當局所給予的答覆，是說不應如此露骨的暴露其弱點，有損當局的顏面，最後還是一頓惡罵。據我所知，向政府提供意見的頗不乏人，結果不是被放進字紙簍裏去了，便是因此遭受當局的處分。都像這種下去，難道也是抗戰中的好現象嗎？

說也奇怪，蔣系統治下的各級政府，本身不願意做，却又不容許別人去做，本身不願意說，却又不容許別人去說；試問，這是為本身的利害打算？還是為國族的前途打算？這種不合理的現象，竟很普遍地散佈在這嚴重關頭，想起來實在痛心。但是痛心的事還在後面，後面列舉的事實，不但使我們痛心，而且使我們覺得很擔心。

（一）共黨陰謀是抗戰的嚴重打擊——過去共產黨對國家人民所造的罪孽，我們早已留下極深的烙印，十年的內亂，使國力受到大量的消耗，人民受到無限的犧牲。到共產黨被迫出走贛南，偏處西北邊境時，其勢本已成為強弩之末，實不難予以一鼓蕩平，那知共產黨穿線的西安事變突起，蔣氏被扣，中央既不惜停止十年剿共的策略，以贖蔣氏，而共產黨亦正好借此機會，假意擁蔣抗戰，以圖死灰復燃，重整旗鼓。中日戰事爆發後，共產黨遂在擁蔣抗戰的煙幕下，發表其堂

皇的宣言，表示覺悟前非，願即放棄赤化運動，取消蘇區與紅軍，待命担任抗戰最前線的職務，並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。當時一般國民雖以為統一已告完成，自可一致對外，但有識之士因為明瞭西安事變後共產黨擁蔣抗戰的內幕，却深知共產黨終不免要掛羊頭賣狗肉，借此來實現其預定的一貫陰謀，而我對共產黨的表示，即從來沒有抱過樂觀。果然，共產黨此項宣言發表不久，就發見該黨首領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陳紹禹等人的許多小冊子和其他宣傳品，細察其內容，意態曖昧，陰謀畢露。接着更有許多極表面化的事實，充分證明其擁蔣全是幌子，抗戰更全是幌子。三年來，共產黨對於實行三民主義，取消赤化運動等等，的確完全口是心非，毫無誠意。毛澤東在「論新階段」裏面說：『目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，我們當然不以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目的，只認為一種過度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』；而共產黨的策略路線一書也說：『民主共和國是我們戰略口號，是各黨各派願意要的，聯合各黨各派，纔能孤立國民黨，用民主共和國，纔能推翻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，纔能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，到民主共和國實現時，我們黨可以公開活動或半公開活動，以無孔不入的手段，來組織羣衆，影響羣衆，及爭取羣衆，以擴大強壯無產階級的軍隊和預備軍，以待必要時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，以達到社會主義之實現』；由此可知共產黨年來的言論與他所發的宣言，完全背道而馳。再就共產黨的組織邊區政府而言，却又破壞了國家行政

的統一，而已經消滅的赤禍，且復獲得死灰復燃的根據地。在所謂邊區政府管轄下的人民，早已被壓迫得喘不過氣，那些地方，不但社會秩序不安，而且已安的反變成更不安，人民生活原很過得去的反變成過不去，一般人民根本得不到一些自由平等與保障，我們只要留心邊區人民的求救呼聲，就可知道這些人民是怎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。至於共產黨的游擊隊，在戰區也是游而不擊，即有攻擊，便是對着友軍，他們往往設下陷阱，陷害友軍，使友軍腹背受敵，常時受到意外的嚴重損失，而共產黨則從中取巧，設法把殘散的友軍，收編為自己的部隊，這種泯絕天良的事實，實在指不勝屈，只此一端，已足揭穿共產黨不惜犧牲國家的實力，以擴張自己勢力的手段，確是毒棘。由此可知共產黨年來的行動與他所發表的宣言更完全背道而馳。他如乘機洗劫民間的財物，誘迫良家的女子，在共產黨武力霸佔的地方，更是習見之事。欺騙青年，麻痺民衆，收買敗類，利用其組織非法集團，宣傳赤化主義，擾亂後方秩序，阻礙政令推行，這些也是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活動的大概情形。煽動與脅迫蔣系和其主子蘇俄聯盟，把整個中國出賣給他的主子，把整個中國變為他主子的附庸，更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。共產黨的勢力，三年來確已日漸膨脹，他們便更咄咄逼人，有恃無恐，為所欲為，無法無天。毛澤東且公開發表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」的荒謬談話，藉向蔣系作一種重大的敲詐要脅，蔣系年來如此受欺，雖是咎由自取，但整個國

家的前途如果竟被共產黨斷送了，這是國人所不能容忍的。現在共產黨為實現其奪取政權，赤化中國的陰謀，一方面挾持蔣系繼續抗戰，而自己則避免損失，保存實力，並不斷擴充其實力；一方面毀謗和平運動，並對參加和運者無理謾罵，且加以漢奸賣國賊等罪名，以阻止和運的成功。為了自私自利，竟不顧國家前途已陷危境，為了自私自利，竟不顧人民痛苦已達極點，這種利己損人，利己禍國的行爲，才真是賣國的行爲。蔣系既受陰謀禍國的共產黨所挾持，實力日損，自由早失，危機之深，無以復加，如此而仍奢言抗戰必獲最後勝利，其誰置信？

(二)政治腐敗是抗戰的嚴重打擊——抗戰所以遭遇不利，論者多說是政治未能配合軍事相互運用的結果，說得明白點，過去只有軍事動員，沒有政治動員。其實，在政治上未上正軌的中國，來談政治動員，本非易事。而政治機構與政治工作人員的是否健全，妥為政治動員的先決條件，我國政治機構的是否健全，這和國家的財力人力有關，而且各級政府及其附屬機關的組織，就表面上看起來，除區以下根本無法健全外，其餘總算還好，因此姑不具論。但是我們一考內地政治的實況，便不由人不痛心。當我在內地從政及考察縣政的時候，政界中人最流行的一句口號便是「為政只要三分真，但須七分假，否則吃力不討好，飯碗保不住」，記得在某地就有從政多年的人這樣勸告過我，據說上面所期望於他的部屬的就是這麼一套，以此上下同流，彼此大部分的時間，便全在堂堂皇皇的公文，告示

，表冊，計劃之類買空賣空的官樣文章上做功夫，一切的一切，不必求其兌現，能夠敷衍塞責，便算並不空勞一場，區騙縣，縣騙省，省騙中央，一級騙一級，天天在大家心目中只存着一個騙字，而且有的還要多用些智慧，企圖騙得更恰當一點，蔣系，並非不明個中底蘊，也許因為曉得大家都是積重難返，只好閉隻眼閉隻眼，假裝不知，為了敷衍場面，新的計劃，新的辦法，新的運動，還是接二連三的頒佈下來，下面呢？有的依樣畫葫蘆，如此這般報告上去，說得頭頭是道，有聲有色，但是據我所知，簡直一件也沒有切實辦過，最多不過照例行一次文，開一次會，下文就沒有了，不久也就寂寂無聞，若無其事，有的懶得麻煩，根本置諸不理。他們這樣陽奉陰違，騙來騙去，可說完全不以抗戰為重，不以國家為重。其次，省以下多數官員，升官發財自私自利的思想非常濃厚，（中央官員自亦難免）一切設施，只要有利於己，便不惜勞民傷財，雷厲風行，否則，縱是福國利民，亦遲遲不決，任意拖延。無數同胞因戰爭而家破人亡，慘酷無比，此輩喪心病狂之徒，却以救國為名，乘機魚肉鄉民，徵兵徵工，則弊竇叢生，征稅募捐，則橫征暴斂，他如利用職務上之方便，或侵佔公款，中飽私囊，或濫用權威，結黨營私，或排除異己，陷害忠良，禍害所及，民不聊生，因此，土匪四處為患，社會秩序不安，而此輩土匪即是受不了貪官污吏重重壓迫與剝削，挺而走險的良民。雖然上面三令五申，要廢除苛捐雜稅，嚴懲貪官污吏，解除人民痛苦

，但試以江西一省而言，各種苛捐雜稅，至今仍達三百七十餘種之多，貪官污吏更隨處皆是，人民怨聲載道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年來以國難嚴重，各種救國捐款的徵募，也一再舉行，照理此種捐款應完全解歸國庫，由中央妥為保管或支用，以實國防，然各地從少層級彙解，非由少數主持者挪作他用，即由少數主持者據為己有，人民樂於捐輸者，原為救國，結果國家又何嘗得到絲毫實惠？再次，身負重責的官員，而且多是貪生怕死或醉生夢死的人，三年來，各級官員輸財救國和為國殉職者，頗不多見，相反的，捲款潛逃和棄職潛逃者，却時有所聞。而他們平日驕奢淫佚的行為，則更是局外人所難想像其什一。如果希望此輩來推行善政，使政治能夠有進步，上正軌，更進而動員政治力量以增加抗戰的實力，那簡直是緣木求魚，徒感失望，或者竟會完全絕望。總而言之，內地政治的腐敗，已達極點，政治動員，只有口號，而無事實，如此而仍奢言抗戰必獲最後勝利，其誰置信？

(三)徵兵困難是抗戰的嚴重打擊——由於新式武器的缺乏，只好用血肉抵擋日軍的炮火與轟炸，因此三年來在戰場上或非戰場上所犧牲的士兵，可以說是無法統計，此種無限數的犧牲，必須有無限數的不斷補充，才能支持所謂全面抗戰，長期抗戰，而此無限數的不斷補充，又全賴政府積極徵集新兵，但是，徵兵的成績究竟怎樣呢？據我所知，可以很武斷地回答是非常之糟。(一)因人民的國家

觀念民族意識很淺薄，國族滅亡或復興的利害，他們根本不了解，要他們拋棄家庭，効命疆場，在他們既認為沒有這種義務，且深知是十分危險的事，所以及齡壯丁，對政府的徵集，總是想盡方法躲避。(二)因男子是一家之主，應負擔或分擔全家的生活，更因家無恆產者，實佔全國十分之七八、如果男子一旦被徵，全家生活，勢必感受嚴重威脅，甚至無法維持，雖政府訂有優待出征軍人家屬辦法，根本等於具文，惠而不實，所以及齡壯丁，對政府的徵集，不得不想盡方法躲避。(三)因主持役政者，乘機魚利，三平原則，徒有其名，人民不能享受平等平均和平允的待遇，自然厭恨政府，不甘應徵。在此不平現象下，有錢有勢者，雖家有壯丁三五人，亦可避免徵兵，安然家居，無錢無勢者，雖然確是獨子，亦多被徵而去，真所謂苦煞了平民，飽死了貪污，便宜了富豪。因為不平，所以及齡壯丁，對政府的徵集，終亦出於躲避一法。上面所說的壯丁，還算是比較純良，因為糾集數十人或數百人避居深山，武力反抗政府徵兵的事也是常時發生。因此，政府徵兵便感覺異常棘手，終不得不出之強捉一法；被捉着的壯丁，全用繩子反捆着雙手，週圍還有荷槍實彈的士兵押着，後面還有無數的家屬啼啼哭哭的跟着，看了這種情形，真使人百感交集。這些壯丁，每被押到一個地方，便關在屋子裏，毫無行動的自由，其中簡直都是些垂頭喪氣，精神萎靡的可憐虫，雄糾糾氣昂昂的人，絕無僅有。他們既被迫而來，心中不是顧累到家裏老小無法謀生，

就是痛恨政府辦事太不公平，或是想到前途凶多吉少，一生完結，於是在後方訓練，便時時想逃，處處想逃，在前方作戰，也時時想逃，處處想逃，防止逃的方，法愈周密，逃走的新兵愈是多，結果，有的地方十個竟逃回來六七個，有的地方十個也逃回來三四個，我們江西，就是如此，這種未戰先潰的現象，在前方及後方，至為普遍；我在某些地方遇到幾位新編師長，他們就情願丟了師長不做，不願帶領新兵，新兵難帶，由此可知。過去，我雖然沒有辦理兵役，但我却接近過無數的新兵，我更接近過無數尚未被徵的壯丁，我還有許多朋友在各縣主持役政，直接簡接所見所聞，與上列所述是無絲毫出入。又據一般辦理新兵訓練的友人說，新兵最先是訓練一年才參加作戰，後來由一年改為半年，由半年又改為三個月，現在已由三個月改為只要能夠開槍，便須參加作戰，如果兵源不缺，當不致糟到這般地步。這也許是日軍步步前進，我軍步步後退的重要原因吧！蔣系如果無法解決此一困難，那麼前線兵員的補充，看看快要絕望了；如此情形，所謂全面抗戰，長期抗戰，似非一般高調者所能獨力支持。然而，事實告訴我們，蔣系並非不能想辦法解決此一困難，過去確實想盡了許多妙法來解決此一困難，無奈任般妙法，終歸失敗。蔣系所持以爭取抗戰勝利者，首謂中國人力充足，所謂人力充足，也不過如此而已；如此而仍奢言抗戰必獲最後勝利，其誰置信？

(四)生產減少是抗戰的嚴重打擊——因為生產區域的縮小，生產工作者的死

難及流亡，生產的停頓或減少，自是必然的現象。三年來，戰區一天天擴大，人民死難及流亡的數量也一天天增加，戰區的生產，事實上可說完全停頓，就說沒有停頓，也已經不屬蔣系所有了。蔣系統治的土地，範圍既一天小一天，兼之（一）因壯丁陸續應徵兵役，從事生產者不能停止原有的工作出征。（二）因各地國防工事（築路破路築機場等亦在內）與軍事運輸頻繁，這些工作，都有待於民工的動員，更因軍事上的變化無常，一旦戰事失利，原來費盡艱辛趕築為我軍所用的各種工事，又不得不全部加以破壞，如果戰局好轉，為了軍事上的需要，又得即刻興工恢復，如此建築復破壞，破壞復建築，所耗民工，實難計算，所以不但年輕力壯者為政府徵工的對象，即一羸老弱殘疾，亦多不免被徵，生產雖重要，只好讓牠暫時停頓。（三）因前方士兵一年四季需要不少草鞋，布鞋，單衣，棉布，斗笠，扇子等等，都要分向民間徵募或定製，所以連婦女也要常常為這些事忙碌着，原可協助男人生產者，因此也不免耽誤了不少時間。（四）因收入有限，生活困難，從事生產工作者，辛苦雖較一般人為甚，並不能維持一家生計，所以也有不少人存着僥倖的心理，相繼拋棄了原來的艱苦工作，去找尋既輕便又易賺錢的事做，在此情形下，生產工作者便多改業了。（五）因躲避徵兵徵工，只有逃亡外地另謀生活，而不能在家安居樂業，原有生產工作，只好拋棄。事實既如上述，安全區及接近戰區便顯然存着一種矛盾的現象，即一方面由於生產的減少，人民

生活所需，便覺供不應求，飢餓的恐慌，充滿在整個的內地；一方面由於生產工作者的減少，有許多田地却無人經營，擺在大家面前的，是無數的荒田荒地，需要人去耕種與開墾，但是荒田荒地，只見漸漸增加，却未見逐漸減少。需要人力的地方，既感覺人力的異常缺乏，相反的，却有無數的人力在那裏浪費，這種畸形的現象，如果不能即刻糾正，生產便無法求其增加，豐富，社會的不景氣，也將隨着農村的破產，而繼續存在，或更覺嚴重。但是，此畸形的現象，果然能夠即刻糾正嗎？這先得把上面五種原因，使牠不再存在，如果戰事不停止，此一問題實無法謀得適當的解決，眼看着社會的不景氣，只有一天嚴重一天。如此而仍奢言抗戰必獲最後勝利，其誰置信？

(五)交通阻塞是抗戰的嚴重打擊——戰後全國各主要交通點線，或被日軍佔領，或被日軍截斷，已不復完全能為政府所用。安全區及接近戰區。雖極力趕築鐵路與公路，但因戰局不時轉變，此種鐵路公路，往往通車不久，即已自動破壞，雖然有的仍能維持，也因車輛過少，白晝又要避免空襲，不敢開車，（火車全部晚間開，汽車却不完全如此）所以亦不能暢通無阻，最感覺困難者，就是鐵路公路被截斷時，全線便不能銜接。試舉一例，譬如昔日由浙江到桂林，汽車可以直達，火車尤其方便，年來便已被截斷為幾段了，有的地段要坐船，有的地段要乘轎，有的地段可以坐火車，有的地段又要換汽車，全程的時間延長到幾倍，全

程的川資也增加到幾倍，途中的勞逸，更有天壤之別。東南諸省如是，其餘各路困難亦不減此。在此種情勢下，商運不必管牠，軍運便受了嚴重的打擊。各戰區所賴以運輸軍需品者，已多改用驢馬隊，土車隊，手車隊，費時既多，每次所能運輸的數量又極少，一旦天氣起變化，行程便只好順着延長、等着後援的戰場上，因軍需誤期不到，常常受到莫大的影響，甚至發生動搖。至於軍隊的移動，也沒有昔日迅速，除少數鐵路尚可運輸少數軍隊外，其餘均須步行，行軍慢，耗費多，艱苦更非我們所能想像其什一，聞四川雲南新兵開到浙贛一帶補充者，須經一個月至兩個月的徒步旅行，始能到達目的地，好的軍隊，或能一路秋毫無犯；但軍紀差一點的，便無法無天，為所欲為，地方受害，人民受苦，交通方便，地方與人民，何致受此不必要的苦痛？而這批長期步行的軍隊，經過一路辛苦，早已疲敝不堪，到達目的地後，必須相當時期的休養，精神才能恢復，西北的新兵開到東南來補充如此艱難，東南的新兵開到西南或西北去補充也是同樣的艱難，其他亦然。（蔣系恐怕新兵逃走，所以要使他們遠離家鄉，無法逃回，但據我所知，新兵還是不斷的由很遠的地方逃回家鄉，江西的新兵就是如此）我軍勞而日軍逸，日軍以逸待勞，也是我軍蒙受不利的重大原因，這不能不說是受了交通阻塞的影響。而接近戰區，非佔有絕對重要性的路線，不但公路早已變為山川湖沼，破壞無遺，即比較大一點的人行道，也全部化為一市尺寬的小路，往來行人，

殊感不便，一遇雨季，便更無法通行，這些地方，便往往有無數的運輸隊及軍隊通過，在此時期，他們也就一籌莫展了。因此前線有時明明可以堅守，却因後援不繼，不得不被迫轉移陣地。據前方退下來的軍官很沉痛的告訴我，陣地所以常常忍痛放棄，多因彈盡糧絕，死亡慘重，呼救無援，無法再守所致。現在賴以運輸外國軍需用品的滇越路滇緬路，也被法英封鎖了，過去可以向外國購買軍需用品，由這兩條路運至中國者，現在已完全被禁運，雖然中蘇要道還能維持現狀，但國外接濟的逐漸減少，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。中國與國際的水路交通，既早被日軍全部封鎖，現在僅有的陸路交通，又遭封鎖，對抗戰的影響，自然很大。由於對內交通的阻塞，影響全國軍運，由於國際交通的阻塞，更被人把握着咽喉，蔣系對各戰場的接濟既不靈通，外國對我國的接濟無望；如此而仍奢言抗戰必獲最後勝利，其誰置信？

(六)民心厭戰是抗戰的嚴重打擊——戰事初起，遭到戰禍的地區不廣，遭到戰禍的人民也很少，未遭戰禍的地方與人民，除了應徵兵役工役及担负少數戰費外，其餘可說沒有受到別的影響；因此，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很淺薄的十分之七八的人民，對整個國族的禍福，並不關心，為什麼要抗戰以及抗戰和他們有什麼關係，也根本不瞭解。不過，國民對國族，對抗戰，雖然如是其模糊，但當初至少也並不反對抗戰和厭惡戰爭。然而戰事漸漸延長，戰區漸漸擴展，因戰事而受的

損失，也隨着一天加重一天，此種損失，直接間接都要在國民的身上謀補充。慘酷的戰禍，簡直迫得他們不能家庭團聚，安居樂業，或竟殉難於炮火之下。戰爭所給予他們的，已使他們感覺到不是生存獲得保障，而是生命遭到威脅和死亡，由於抗戰給予他們這種共感，厭戰的思潮就不時在他們腦海中起伏着，久而久之，更普遍到全國。我何以說慘酷的戰禍，逼迫他們不能家庭團聚，安居樂業，或竟殉難於炮火之下，而引起他們的厭戰呢？事實很明顯；（一）由於戰區的擴大，難民的數量，據各方估計約一萬萬左右，這些難民，多半無家可歸，流離失所，有的靠所帶的一些財產在外維持生活，有的靠在外做苦工維持生活，有的全靠各地的救濟機關收容，但是日子長久了，帶的錢總會用完，救濟機關也因力量有限，難以久支，於是大家的生活，不免失去了倚靠，有的便只好成羣結隊流浪各地，專靠乞食為生，年輕力壯者在此情況下，還能與艱苦奮鬥，而苟延殘生，老弱之輩，就受不了飢寒與疾病的侵襲，而死於溝壑。在安全區及接近戰區，真可說哀鴻遍野，餓殍載道，我們隨時隨地所能看到的都是些面黃肌瘦的影子，所能聽到的都是些悲嗟呻吟的聲息。未死者想到自己逃亡後處境的困苦，看到親屬和同伴死亡的淒慘，便不免憶起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半朝難」的古話，而人人思念家鄉，人人想回家鄉。因此，凡是難民，都希望戰事趕快結束，以便設法回鄉。（二）戰後民間普遍有四怕，第一怕徵兵，據說當兵是凶多吉少，有去無回，第二怕派伙

，據說雖不像當兵那樣危險，有的却往往一年半載才能回家，（其實被派的都是短快，到約定的地點，即可回家，只因軍隊不守信用，往往有此現象）有的也受不了士兵無理的鞭打，第三怕徵工，據說被徵去做工事，也是相當辛苦的事，第四怕增加捐稅，據說人民負擔太重，不斷增加捐稅，只有死命一條。但是，三年來，有許多人眼看着自己千辛萬苦養育成人的子弟被捉去當砲灰，消息全無，派快和徵工，有些地方三五天就輪到一次，有些地方或只隔一天就輪到一次，簡直應接不暇，毫無甯日；而苛捐雜稅的增加，更使人民透不出氣，單就賦稅的不斷增加而言，竟使田主情願放棄主權，而把自己的田產送給佃戶；更兼貪官污吏的混水撈魚，橫征暴斂，重重剝削，人民尤其苦不堪言。因此，具有以上四怕心理的人。都希望戰事趕快結束，讓他們多留住幾條性命，少受幾天苦難。（三）由於天災人禍的相繼沓來，非但一般平民無以為生，即中上的家庭亦已蒙受相當的影響，叫苦連天；昔日幾塊錢便可活一條命，現在却別想再過那種日子。不是嗎？最近就有許多地方鬧飢荒，六七十元甚至一百元以上只能買一担米，而且有時竟無米可買。我就看過許多人家一天只吃兩次米湯，我更看過許多人家把樹皮草根當飯吃，（浙江武義隣近某地去年就有人吃樹皮草根，今年浙江甯紹一帶也如是。）我就看到許多人家忍心把自己未成年的兒女拋棄在荒郊，我也看到許多良家的女子，為了飢餓的驅使，不得不出賣靈魂與肉體，去換取另一個世界的哥兒公

子的金錢，來解決家庭的生活。這些受苦受難的人家，對國家都有不少的功勞，因為他們的父親丈夫或兄弟子孫，不是被政府徵去當兵，就是被政府徵去服勞役，然而這種人有那個去可憐他呢？年來像他們這種遭遇的，實在太多，如果不受戰爭影響，他們何嘗不是安居樂業的快樂家庭？因此，無數站立在飢餓線上的人，都希望戰爭趕快結束，以便回復他們戰前快樂。以上所介紹的幾種人，便都是厭惡戰爭的人，而且是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七八。人心如此渙散，抗戰還有什麼辦法？如此而仍奢言抗戰必獲最後勝利，其誰置信？

由於共產黨的陰謀禍國，與內地政治的腐敗，生產的減少，徵兵的困難，交通的阻塞，人民的厭戰，即夠使抗戰受了嚴重的打擊，這些都是抗戰陣營中，不可隱瞞的缺陷，其他如法幣的貶值，經濟的枯竭，外債的無法借貸，公債的無法銷售，更使蔣系對這一筆浩大的戰費，早已漸漸不堪担負，這些也是抗戰陣營中，所發生的嚴重問題。當然我們並不應也不能全盤抹煞抗戰的價值，這次的抗戰，確實已使日本認清中國不是用武力可以滅亡的，要增進東亞真正永久的繁榮，必須先求中日兩國的共存共榮，相互合作。日本能有此種覺悟，這不能不說是抗戰所收的良好後果。而若干軍民在抗戰期間，為國族犧牲奮鬥的精神，與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，亦誠值得我人之尊敬和記取。雖然在黑暗一方面，儘管有着自私自利醉生夢死的官員民衆，不以國族前途為重，但在光明一方面，總算還有這些

忠勇的軍民，能為國族揚眉吐氣。這自然也不是應該忽略的事實。

不過，全面抗戰，長期抗戰，已把整個國族拖得凋敝不堪，已把全體國民拖得不能呼吸，而焦土抗戰，更使祖宗遺留下來數千年的精華，孑然無存，使國民黨過去慘淡經營規模宏大的各種建設工程，全部毀於炮火，而全國各級學校及文化事業，工商企業，能保持完整者，也是極少數的少數，其全部份或大部份都做了戰爭的殉葬品。戰後的中國，農村是破產了，各種建設事業是破產了，教育破產了，政治是破產了，經濟也是破產了，國民一切的一切更是破產了，國家與人民因抗戰而受的損失和犧牲，實在太慘重，太可怕，太令人不敢回想與直視，而且不願回想與直視。如果這種支離破碎的局面再硬拖下去，接着恐怕便是全局的毀滅；此凋敝不堪的國族與不能呼吸的人民，恐怕不久便要遭遇整個的沉淪了。當然我不應丟了日本因戰爭而受的損失與犧牲一字不提，事實告訴我們，日本這次的損失與犧牲，也是非常慘重，非常可怕，由於戰爭的擴大持久，日本的國本，也多少感到動搖。但是，我們過去預斷日本因戰爭延長，必定會發生種種變亂和破綻，以致不能支持戰爭，被逼自動退兵的幻想，至今還是一個幻想，日本不但沒有發生什麼變亂與破綻，相反的，我們自身所發生的嚴重問題，却一天多一天。我上面所敘述的，只是比較普遍的現象，還有許多於抗戰不利的事實，舉不勝舉，過去社會一般知名之士對此常有極具體的檢討，也用不着我來贅言了。

汪主席說：『國家以保衛其生存獨立為目的，戰而可達此目的則戰，和而可達此目的則和』；又說：『當初以為日本要滅亡中國，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，最高目的自然是想救中國於滅亡，最低限度，不能救國，亦可殉國，如果當初的抗戰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，那麼，在今日必然以當初一樣的誠意來謀和平之實現，因為只要使中國不致滅亡，則最高目的已達，當初的戰，今日的和，完全是一貫的，沒有一些矛盾』。誠然，抗戰也好，和平也好，只是救國的手段，現在事實擺在面前，繼續抗戰確是死路，繼續抗戰決不能達到救國的目的，恢復和平才是生路，恢復和平決不會達到救國的目的。過去的抗戰，在求國族的生存獨立，抗戰三年，創鉅痛深，倘猶能以合於正義的和平而結束戰事，則國族的生存獨立可保，即抗戰的目的已達，和平既是生路，為什麼不走生路而走死路？抗戰既是死路，為什麼要走死路而不走生路？蔣系並非不懂此理，祇因受了陰謀禍國的共產黨所挾持，只好明知故犯，這是蔣系的對國不忠，也即是共產黨的對國不忠，為了本身的權位而不惜葬送國族前途的份子，我們應當共起而伐之，以保存國家殘餘的生命。

國人應有的新認識，就是要認識抗戰是死路，和平是生路；國人應有的新行動，就是要更進一步，脫離抗戰，投向和平。為了救國，當不顧拋棄一切，做一個蔣系的叛徒，為了救國，當不惜犧牲一切，做一個和運的戰士。時至今日，和

運的前途，已很光明，和運的成功，已很逼近。雖然仍有一些人高唱「抗戰必勝」的口號，這是受着蔣系的壓力不得不然，但是不管蔣系用盡種種壓力要大家都隨聲附和 high唱「抗戰必勝」，然而響應與擁護和運的人，已經不僅僅是蔣系所謂的少數想做官發財的投機者，而是全國大多數的國民，這些人難道不怕被罵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嗎？即此一點，便值得我人深省了。

執筆於參加和運後一週，時為二九年八月八日。

